

王重民法国读书记

刘 修 业

三十年代，王重民除在英、德、意诸国访书之外，还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离法。在此期间，重民着重研读被伯希和(P·Pelliot)所劫而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两千多份敦煌卷子。重民对每份卷子逐一著录，重要的则摄制显微胶片（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编出《伯希和劫经录》（后编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访书所记之资料，至一九六二年还在陆续整理，故将其离法以后者，作为附录载于文后，现摘录于下：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撰《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重民至巴黎后得见国人所未收集的太平天国文献，共十四种（重一种实十三种）。有①天父上帝言，②天父下凡诏书，③天命诏旨书，④出麦西国，⑤天条书，⑥太平诏书，⑦太平礼制，⑧太平军目，⑨颁行诏书，⑩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⑪三字经，⑫幼学诗，⑬太平救世歌。此文先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后来，《图书季刊》2卷2期（1935年6月）转载，又编入重民所撰《图书与图书馆论丛》。

三月十六日，撰《海外希见录》之一。著录文件有二：（一）《罗马教皇致大明国国主书》版片。此版片的版心高三十七公分，宽七十三公分，共三十六行，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系一五九〇年（明万历十八年）罗马教皇喇嘛第五（Sixte V）致明

神宗皇帝的原文（用中文写的），此可作明末天主教来华传教之重要史料。（二）《毕方济修齐治平颂》。此《颂》是毕方济在闽进呈唐王，盛赞唐王为英主。是抄本，其价值是在于能与明末史事相印证，相补苴。卷首弁以唐王御制答诗和郑芝龙赠诗。

四月九日，撰《〈毛诗音〉跋》。此残卷首尾残缺，存者仅九十八行。重民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相校，此卷所引徐氏有三十一则，文字同者八条，因之定为晋徐邈所撰。卷子中“世”字不缺笔，“民”字或缺或否，殆为贞观初写本，故对唐玄宗李世民避讳（此《题跋》曾寄给北平的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以偿他答应为他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之诺言。此《跋》收入《巴黎残卷叙录》第一辑。后又编入《敦煌古籍叙录》（1985.6，商务印书馆）。

此时还撰写了《〈白泽精话图〉跋》。此残卷存有丈许，前幅有图无说，后幅有说无图。书名是取《开元占经》卷百十六引孙柔之《瑞应图》云：“黄帝巡于东海，白泽出，能言话，达知万物之精，以戒于民，为除灾害。”《南史·梁简文帝纪》，有《新增白泽图》五卷，则此书六朝时已有。清洪颐煊《经典集林》，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均有《白泽图》辑本一卷，只辑其说，图则久佚。而此残卷尚存图二十幅，着以彩色。藉此可以窥见我国中世纪对于万物有灵之想像图，故极可珍贵。（此跋只署一九三五年，未加月、日，收入《巴黎残卷叙录》第一辑，后又收入《敦煌古籍叙录》卷三子部上。此跋也寄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收入台湾出版之《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也未署重民的名字。）

五月三日撰《帝王略论跋》。此残卷原题《帝王论》，前有序。卷一起三皇止秦二世，卷二起汉高祖止元帝。以下残缺。于贤君恶主，略述其事迹，又加以评论，以寓褒贬之意。《唐书·艺文志》子部杂录有虞世南《帝王略论》五卷，此残卷缺三卷。

其中文辞肤浅，当为初学而作。（此跋也寄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据《郡斋读书志》，马聪《通历》云：“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因益信此残卷系《帝王略论》残卷，只缺一“略”字，作《帝王论》。检诸家藏书志，知此书尚无刻本，仅有传抄，且前三卷已散佚。重民又据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通历》所引《帝王略论》三十八事均有之。但所引始于三国之末，是因前三卷已佚，而巴黎图书馆所藏残卷适为前二卷，可补《通历》所引之缺。按《通志》记原书共十卷，上起上古，下迄隋代，此《帝王略论》应写于唐代。重民又写《补记》一则。次年四月十七日，又检阅《太平御览》卷二十九中所著录《虞世南公子先生论》，与《唐文拾遗》辑本相校，确知此残卷为《帝王略论》，又写《补记》一则。（诸题跋已收入《巴黎残卷叙录》第一辑，后又收入《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部。）

同日，又撰《〈阡外春秋〉（唐李荃撰）跋》。按此书“纪将军阡外之事也。历选明君良将，战争攻取，皆约史以成义，综八代以为十卷”。分存卷一至卷五，起周秦至三国。原书十卷则止于唐太宗擒窦建德事（罗振玉得此写本卷四、卷五，已影印行世，并撰跋以纪之，收入《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跋中考定李荃系《集仙传》所称“荃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重民又发现卷一、卷二，可以接罗氏所未印。此残卷卷端有李荃《进书表》，在表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布衣李荃上表”。重民疑罗氏所记李荃事迹有误，因唐时有两个李荃，一作筌，一作荃，罗氏混而为一。撰《阡外春秋》系李荃以布衣终。此跋末附《进书表》全文。（此跋亦曾寄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将罗振玉所撰跋与重民所跋合并为一，似为编者所修改，但亦未署名。此《跋》已收入《巴黎残卷叙录》第一辑，后又收入《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部。）

五月，撰《毛凤枝金石草编补遗稿本》一文，寄北平图书馆杨殿珣先生。杨氏写一跋，并附《智永千文考》，是年七月四日在《大公报·图书副刊》86期发表。按毛凤枝字子林，江苏甘泉人，幕游秦陇，酷嗜金石，著《关中金石文字存佚考》等书。有未刊本《金石萃编补遗》，后由伯希和于一九〇八年在西安购得，携回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此稿本著录秦陇、新疆等地金石约三百多种。

五月二十七日，撰《〈云谣集杂曲子〉跋》。略记此敦煌本传抄至中国之原委。有两写本，一藏于巴黎图书馆，有十四首；另本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有十八首。除去重复，得三十首。初由朱孝臧据董授经摄影刻入《蕙风簃丛书》，朱氏有跋记其原委。罗振玉据伯希和之摄影，收入《敦煌零拾》。罗氏有跋记其原委，并附王国维跋考，甚详。后刘半农来巴黎，始将巴黎藏本抄回国，刻入《敦煌琐缀》中。一九三二年，龙沐勋据两本校定为三十首，益以朱孝臧、董康等校语，另为《校记》一卷，印入《彊村丛书重刻本跋》。重民又见到巴黎藏本摄影，并写出所校误字，收入《巴黎残卷叙录》第一辑。后又收入《敦煌古籍叙录》时，并将朱孝臧、王国维、龙沐勋三跋，一并印出。后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又将此《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编入《词集》中。

九月十九日，撰《〈东皋子集〉跋》。此卷首尾残缺，载赋三篇，起《游北山赋》之后半，《无征赋》全，讫《三月三日赋》之前半。《游北山赋》知为唐王绩所撰之《东皋子集》之残卷。因知此卷为吕才所编《王绩集》五卷本的原帙。按《唐书·艺文志》和晁公武《读书志》卷十七，著录《王绩集》作五卷。此写本为卷四有伪周武后所制定的新字，知为武后时写本。《全唐文》中缺《元征赋》，重民乃逢录此赋附于题跋之后，以补《王绩集》之缺，并校勘《北山赋》之异文，籍以窥见敦煌残卷之可

贵。此《跋》和《校勘记》收入《巴黎残卷叙录》第一辑，后又收入《敦煌古籍叙录》卷五集部。

十月二十五日，撰《〈今字尚书〉跋》。有两个卷子，甲卷为《尧典》，共三十五行，书法工楷，颇似欧褚，假定为初唐写本。校其文字，全篇无左字。乙卷为《周书》，起《多方》之后半，讫《立政篇》后题。“世”、“民”、“基”三字并缺笔。审其笔迹，似较晚，或出于天宝改字以后所写。此两卷存古字较多，恐非出于卫包所改之今文本。然则天宝以前，亦有今文。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序》云：“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说者谓今文从此始，古文从此绝。殊不知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之后，又别有古文也。《隋书·经籍志》有《今字尚书》十四卷，是隋以前已有今书矣。益变古文为今文，实自范宁始。宁自为《集注》，后之传写《孔传》者，从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盖自壁书既发，孔安国以今文续之。初唐欧、虞既出。楷法大行，天宝时玄宗诏令改古文以今文；盖隶书既死，不尔则一般人不能读。阮元谓今文始自范宁，重民在此《跋》则以为对于改字，不必专有所指名。六朝至唐，由隶变楷，在书法进化上，自然之趋势。但《尚书》有古文之名，学者徂于师承，邈有传写古文字体之变化亦独缓。自卫包改字则士子按溯流使今文风行海内，不百年古文几绝。重民从此二残卷书写年代观之，若所考定不误，则改古文为今文已在卫包之前，可为阮元之说作佐证。此《跋》亦曾寄与北平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台湾所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收有此解题，但文字稍异，当为编者所修改。亦未署重民的名字。）（自一九三五年以后，重民已看清日本侵略中国的真面目，不再为他们撰写提要。）

重民所撰《巴黎残卷叙录》第一、第二辑，收敦煌卷子题跋共八十六篇，其内容与他所寄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提要相似，不一一列举。

十一月十一日，撰《金山国寄事拾零》。新、旧《五代史·吐蕃传》云：“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我国载籍中，记金山国事者，仅此二十字。重民从巴黎藏的卷子，搜集得金山国坠简《白雀歌》、《龙泉歌》各一首，《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宰相状》各一件和其他杂文五篇，经校录、考订，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可纪。千载坠史，得以重见于世。此文载《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12月）。

十二月十日，重民撰《〈簾金〉残卷跋》。此残卷蝴蝶装，盖其式以三数叶重为一折。存者为自序，《帝德篇》、《名君篇》、《明堂篇》、《功臣良将》等。此乃李若立撰的原书。与《略出簾金》本对读，则编者张球移易删削之迹，一目了然。此《跋》重民未收入《巴黎残卷叙录》和《敦煌古籍叙录》。重民生前未刊出，笔者加按语，刊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5月，中华书局。

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撰《敦煌本〈捉季布传文〉》。敦煌卷子中，有关“史传变文”以《捉季布传文》传抄本最多，而且最为完整。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重民就变文所演事绪加以考订，并与英、法两国图书馆所藏十种卷子，加以互校。刊在是年《北平图书馆馆刊》（10卷1期）。后收入《敦煌古籍叙录》中。（之后又收入周绍良、白化文编的《敦煌变文论文集》，1982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按：由《大公报·图书副刊》发表的《巴黎残卷叙录》，本年编成《叙录》第一辑出版。共四十一篇，分四卷。卷一为经部，收《古文尚书》等，卷二为史部，收《史记》等，卷三为子部，收《刘子新论》等，卷四收《楚辞音》等题跋。后继第一辑出版，重民又将在《大公报·图书副刊》陆续发表的叙录于一九四一年编成第二辑。共四十五篇四卷，经部收《古文尚书》等，史部收

《汉书》等，子部收《百行章》等，集部收《李峤杂咏注》等。北平图书馆一九四一年出版。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撰《阅读张介侯先生遗稿记》。张澍字介侯，甘肃武威人，生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卒于道光间，遗稿有《养素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二十六卷，还有《姓氏五书》等。伯希和得之中国关中故家。在未携往巴黎时，曾先以张氏所撰《西夏姓氏录》一书示罗振玉，罗氏为此书写题跋，收入《雪堂丛刻》。重民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时，见到张氏遗稿共十七种，四十八本。他乃以这些稿本校对刻本，往往有在刻本以外者，且多为付梓后所续作。时国内冯国瑞编的《张介侯年谱》出版，将所读张氏遗稿条记冯氏所编《年谱》上，所增辑过半，乃重加写定，撰成此文。

三月二十三日，撰《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此文所记，以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所劫去的敦煌卷子中的写本历日内推《七曜历日》一种，东西学者，颇多相关之论著。文中详述敦煌历日，其朔闰与五代、宋代历日不同，以及七曜吉凶之说，多采用敦煌通行本历日之故。他就同光、显德、雍熙、淳化四历作比较表以明之。本文原拟为《张菊生（张元济）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所作，因稿寄到较迟，不及辑入，乃在《东方杂志》34卷9期（1937年5月）上发表。后又收入《敦煌遗书论文集》中。

六月十四日，撰《七十一传》。乃以在《大公报·图书副刊》185期发表。“七十一”号椿园，满洲正蓝旗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二十六年（1761）任武涉县知县。武涉居南北黄沁之间，常有水患，为预防计，筑堤数百丈，经费不足，公廉俸以足之。堤竣工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民感其德，号七公堤。公于是去任，出关探河源，因撰《异城琐谈》，刊行后又称《西域见闻录》。因今人不知其事迹，重民乃为之传，拟收入《显微录》（此《显微录》系把清代有成就的学人，事迹缺而不显

予世者，重民搜秘探微，编成此书，以显其功绩。）

一九三八年三月，撰《〈众经别录〉跋》此残卷首尾缺，无书题，残存的三篇佛经，著录有佛经八十部，每部佛经记有翻译的人和时期，并以独特的解题方式揭示每部佛经的所宗。重民撰此跋，与《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的记载作对照，考定文卷子既是《历代三宝记》所称的《众经别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的佛经目录，也是仅存于《汉书·艺文志》的现存第二部最古目录。重民将这一残卷摄制照片，带回国内。此佛经目录之跋已收入《敦煌古籍叙录》卷三子部中。

按：在敦煌卷子中，保存了不少通俗曲子词，重民将他在英、法图书馆校录的曲子词，编成专辑，取名《敦煌曲子词集》。（此集195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又修订再版）

重民遗下的部分敦煌抄录资料，经中华书局《文史知识》主编柴剑虹的介绍，并由他送交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以供研究敦煌学者的参考。

重民抄录的天主教来华教士的华文论著等资料，赠与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因何氏是研究来华教士利玛窦的。

附录：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撰《跋太公家教》。此书是从中唐到北宋初最流行的一种童蒙读本（750—1000）通用在中国本部。从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的中叶还被中国北部和东北辽、金等各民族译成本民族语言本。敦煌卷子中，保存此书写本甚多，王国维首据罗振玉唐风楼藏本作跋（载《观堂集林》卷二十），重民又为此书写题跋述其原委。

按：此跋未发表。重民逝世后笔者编入《敦煌遗书论文集》，重民还撰《太公家教考》，已收入《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1950年出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重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撰《跋〈伪本虞恭公温彦博碑〉》。这是前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为伯希和所得金石拓片编目时，见到的唐温彦博碑文拓片，在徐时栋《烟屿楼文集》卷三十五收入此碑文拓本，并撰有《跋旧塌虞恭公温彦博碑》。跋中叹此拓片“为天上之本，超绝人间”。而经重民细审，实为伪本。唐温彦博碑文以罗振玉校写本为最备，得全字凡二千一百有九，半字二十有六，所据为何梦华旧藏拓本，载《昭陵碑文》中。重民因据《隋书》和《新唐书》所记有关温彦博史事以考定徐时栋所据本凡二千六百五十七字，其本不佳，于文字磨灭之处，以意拟补之，不免常有牵强附会，罗氏所校写较合乎史实。此跋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发表在《图书季刊》(新6卷1、2期)后又编入笔者所编的《冷庐文薮》。

敦煌卷子中，还保存了不少珍贵古典文学资料，有诗歌、曲子词和说唱的变文等。重民在巴黎图书馆也曾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回国后才逐渐整理出来。一九四七年二月，重民从美国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即将所抄录的《五更转》、《十二辰歌》、《十二月》等俗曲，以时间为顺序，加以整理。《说〈五更转〉》，在上海《申报·文史周刊》2期(1947年12月13日)发表。后读到魏建功先生撰《十二辰歌》(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23期(1947年4月2日)，重民因之在是年五月六日撰《读〈十二辰歌〉》。重民引《传灯录》卷二十九宝志和尚的《十二时颂》、《仰山集》卷二有宝公萨善的《十二辰歌》。这篇只作了一些补充的短文，在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30期(1947年6月4日)发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撰《说〈十二月〉》，国外敦煌卷子只看到一卷，重民考定用十二月的次序作诗歌应较用五更、十二时为早，并引刘昭《后汉书补志》第八《祭祀志》：“又为

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文。”这大概是最古的十二月诗了。重民认为如拿敦煌卷子的《十二月》和所谓欧阳修《十二月词》来比较，便又觉得敦煌出的《十二月》更活泼而有生趣，使人认识大众通俗文学的价值。此篇《说十二月》在上海《申报·文史周刊》7期（1948年8月24日）发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重民在北平午门为历史博物馆筹备了一个“海外中国文物照片展览”，他解说展览中的敦煌古书的绪论，重点解释敦煌刻本和有插图的书，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六日（清光绪26年）在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千佛洞的第288个石窟里，发现了封闭近千年的两三卷古写本，震动了国内外的学术界。到一九〇七年（光绪33年）来了第一次劫取这批古籍的英国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他领着中亚考古的探险队，花费了极少的金钱，欺骗王道主管石窟，便哄得二十四箱古写本、五幅图画和其他佛美术品，由印度运往伦敦，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次年，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也追踪到了敦煌，自三月三日进洞至三月二十六日选定了精华，劫往巴黎。当时，伯希和还挑选了适合中国士大夫脾胃的几十卷，绕道来北京，士大夫们才知道敦煌古籍的价值。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八月二日，学部给兰州制台拍电报，叫他们到千佛洞去调查，不论完全与残缺，一齐解到学部。可是解送的官吏们，把好的都偷走了，剩下送交京师图书馆保管（今归北京图书馆）。在展览中，有一部咸通九年刻的《金刚经》，还有唐代的韵书，都是咸通九年以后刻的。北京图书馆藏的一部《对相四言》，是看图识字的儿童课本，比欧洲现存最古的一六五八年印的一部插图儿童课本，早一百五、六十年，而比这里展览的插图本《十三经降魔变文》更早得多。

敦煌新出的词，虽流传的不多，却引起词学界的很大注意。王重民所看到的敦煌词，共有三十二个卷子，辑得二百一十二首，去其重复还有一百六十一首，取名《敦煌曲子词》（1950年1月由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10月修订再版）。

曲子词的“菩萨蛮”一调共得十八首，因撰《记敦煌新出的菩萨蛮》（未署年月，于1948年1月26日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78期发表），都应该是唐末作品，相当于韦庄的时代。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撰的《小说十二时》，发表在上海《申报·文史周刊》22期（1948年5月8日）。重民在国外所看到十九个敦煌写本，校定为十种，带回国。把一日一夜分成十二时的时代，不晚于把一夜分成五更的时代，假定在西汉，不会错误。

一九五〇年一月，出版《敦煌曲子词集》，所辑曲子词，均著录自敦煌所出残卷，共录曲二百一十二首（内13首残），以相校补，除重复五十一首，共定录一百六十二首（内7首残），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编成初稿，并撰《叙录》直至回国后，又请几位专家和朋友们校阅一遍，至一九五〇年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一九五七年又修订再版。此书之编成，给我们拓展了文学欣赏的领域，也给我们研究文学史以启示和印证。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三日，撰《敦煌文物被盗记——并论其在学术上所造成的损失》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1951年5月）。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二百八十八个石窟里，发现藏了九百多年的古写本和艺术品。主管这个石窟的王道士曾拿一些作为礼品，去“交官接吏”。但没有人过问。七年以后，就出现了几国来华探险队的欺骗和掠夺的行动。除斯坦因、伯希和之外，还有日本大谷光瑞所派遣的探险队，一个名吉川小郎的，向王道士骗走了一百来个卷子，橘瑞超骗走了三百六十七个卷子；还有一九二四年美国的华尔纳（Langdon Wavner），用化学药品铺在布上，在敦煌偷偷工作五天，偷走了古壁画二十多幅。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撰《〈敦煌古籍叙录〉述例》，此书是三十年代在法国所写四部书的一些题记，加上罗振玉、王国

维、刘师培、陈寅恪等老学者对这方面所写的一些序跋以及一九二五年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共二百多篇。全书分五卷，依四部分类法排列，古宗教书序跋排在佛教、道教之后，变文排在集部诗词之后，一九五八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一次。

在敦煌卷子中还有变文材料，重民在法国图书馆工作时，已经注意到，并撰写了《敦煌本〈捉季友传文〉》等文。

重民从一九四七年二月由美回国，至一九五七年曾与王庆菽、向达、启功、周一良和曾毅公五位同志搜集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一百八十七个写本，加以整理、校勘，选编了七百一十八种，汇校为《敦煌变文集》二册，于一九五七年八月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汇校虽不能说是最完备的选本，但在当时总算是较为丰富的一部变文辑。

重民在汇校此变文集时，曾写了一篇《敦煌变文研究》，仅在北京大学作过报告，后由笔者整理，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发表。文内列出写本篇目并作了说明，解释“变文”名称的意义。对变文发生、发展和转变的源流，也作了研究。这是他试用新的观点来分析敦煌材料的代表作。

一九六一年，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材料来源：一是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卷，（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二是《斯坦因劫经录》（刘铭恕据中国科学院所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显微影片著录）；三是《伯希和劫经录》（王重民编）；四是《敦煌遗书散录》（包括十九个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卷子目录）。十一月十一日，撰一篇《后记》，说明这一部“总目索引”的编辑与出版，是总结了过去五、六十年所积累的总成就，代表着敦煌遗书目录到现在为止的总成绩。当时重民还推想在五年或十年以后，要编出一部统一的，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敦煌遗书总目”，但至今看来，是难以编出的。因还

有一部分敦煌卷子，藏于苏联国内和私人手中，他们还没有公开发表。

重民在法国图书馆时，根据该馆所藏敦煌卷子对《全唐诗》进行了补遗，回国后又请王仲闻等先生校阅。发表的有三篇：《补全唐诗》，《中华文史论丛》（1936年第3辑），补出诗三十七首（内残三首），附者四首，共一〇四首；《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是重民遗稿，后经白化文先生整理，署名舒学，载《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第1期）补诗七十二首；《补全唐诗拾遗》，是笔者整理重民遗稿，发现的《补全唐诗》的诗，又加上发表于《文物资料丛刊》二十二首，重加校订，取名《拾遗》，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辑）。这三篇，后又收入《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年7月出版）。重民在北大时，曾撰《记敦煌写本的佛经》初稿，还作过报告《敦煌四部书（1900—1959）的提纲》但未发表。经笔者整理后，收入笔者编的王重民撰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4月出版）。

一九六二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请重民校辑《徐光启集》，此集分上、下二册。他开始搜集他从国外著录有关徐氏资料，撰写了一篇《徐光启致力科学研究的事迹和他在我国科学史上的成就》的序言。书后还有二篇附录，是关于徐氏《传记》和《徐集参考资料》。

注：

①《王重民1935—1939年英德意诸国访书记》，载《文献》杂志1991年第4期。

作者原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